

# 曾虛白（1895 - 1994）：〈新聞教育的領航者〉<sup>1</sup>

朱立<sup>2</sup>

## 摘 要

曾虛白，江蘇常熟人，學貫中西，曾與父親辦真美善書店與編《真美善》雜誌。先生對新聞萌生興趣始於《庸報》，後在上海辦《大晚報》，多所創新。對日抗戰時，先生負責國際宣傳，來台後，任中廣副總經理及中央通訊社社長，建樹良多。一九五四年，創政大新聞研究所，任所長近十五年，開啓我國新聞傳播研究傳統。政大退休後，在文化大學任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為國育才。先生溫文儒雅，有所為亦有所不為，是位德高望重的新聞傳播教育家與新聞工作者。

## 壹、幼承庭訓，學通中西

### 一、鄉風、家學、慈父

曾虛白，本名燾，字煦伯，初以字行，後取其諧音改名虛白。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農曆甲子年三月二十五日），曾先生誕生於物阜民豐、文風鼎盛的江蘇常熟，是家裡的長子。曾家是當地的四大世家望族之一，先生的曾祖、祖父和父親都中過舉，以道德文章受到鄉里的敬重，鄉風與家學陶鑄了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道德操守，並決心做「一個不折不扣的讀書人」（自傳，頁 1-8）。曾家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與不下一、二十個小孩的嘻戲打鬧中，曾先生培養出了服務的精神與領導才能（自傳，頁 9-15）。在常熟，曾家富甲一方，祖居「虛廓園」有如台北板橋林家花園般，大宅第有三廳兩堂與前後天井，但這大量空間卻只能做鋪張且不常有的婚喪等「禮儀典範」用，未為日常生活着想。對此設計，曾先生年輕時便大不以為然，對「老宅心懷不滿」（東海大學建築系，1973；馬之驢，1986，頁 10-11）。曾先生重內涵而輕虛榮排場，這個品性是年輕時從觀察日常生活中就養成了的。

常熟的靈氣與曾氏家風之外，影響曾先生人格成長最大的是父親孟樸先生（1872-1935），民國建立後，他當過江蘇省議會議員、省政府官產處處長、財政廳長、政務廳長等職，但始終是個有原則、有理想的知識分子。齊燮元、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在江蘇，他總想方設法與他們週旋，力拒他們對省政的干預和對地方的苛索，以維護江蘇權益。不過，孟樸先生最後還是離開了政界，回到了最鍾愛的文學上（自傳，頁 22-25）。清末，孟樸先生曾在上海創辦小說林書店，五

<sup>1</sup> 本文發表於《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 IV》，台北：國立教育資料館，2009 年 10 月（頁 23-40）。

<sup>2</sup> 作者朱立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教授。

十四歲脫離政界後又開起了書店，用法國浪漫主義標榜的口號「真美善」命名，一方面好鑽研自己喜好的文學，也同時可推動社會的文藝風氣與興趣。孟樸先生將書店的經營管理全權交給了兒子，由曾先生任經理兼《真美善》編輯，是曾先生創業之始（自傳，頁 81 - 85）。

孟樸先生的文學造詣深厚，開真美善書店時，已經鑽研法國文學二十九年，他欽敬悲天憫人的大文豪雨果，想效法他用如椽之筆揭露、批判社會的腐敗與黑暗，發動文學與政治的革命（自傳，頁 86 - 88）。譯介西洋文學、開書店只不過是孟樸先生實踐理念的一步，他自己也在創作上下了硬功夫，《孽海花》與《魯男子》便是他對當時社會批判與期望，兩部見證時代變遷的鉅著都曾名噪一時，對文壇與社會都起了重大影響（自傳，頁 16 -21）。受到父親的影響，曾先生愛上了法國文學，也扎下了自己的文學根底。

父親飽讀中外古今巨著，父子兩人又開辦書店，自是往來皆鴻儒，如郁達夫、鄭君平、葉聖陶、陳望道等百多名人都是曾府常客，把家變成了文藝沙龍。這樣的環境當然也感染了曾先生，他自述道，他最喜歡讀的有六本書：卡萊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奧斯汀的《感知與感觸》、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卡夫卡的《美國》、喬歐司的《猶利雪司》與邊勒魯意的《阿弗洛狄得》。這些書談人格領導、寫男女情愛、敘老莊無為哲理、創嘻笑怒罵新文體、試讀者難明之筆或大膽寫人生變態，啟發了曾先生的文學修養與人生哲理，而在真美善書店的三年半間，自己也寫了三十幾篇短篇小說和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自傳，頁 91 - 93）。

## 二、 三育奠基，聖約翰打磨

在自傳裡，曾先生自述，家鄉、曾家和父親是「塑造我之為我的三柄鑿子」，使他關心家國，成了一位投入社會且勇於負責與革新的讀書人（自傳，頁 1 - 26）。在家，三歲讀的是老師自《爾雅》選撰的方塊字，五歲讀的是《時務報》、《強學報》、《湘學新報》、《新知報》等維新報刊中選出的文章。小學，曾先生讀的是三育中學，老師講的是四書五經、《古文觀止》、《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古籍，曾先生要背、要寫讀書心得，為他的國學修養扎下了深厚的基礎。曾先生在三育度過中學的第一年，第二年則轉到了南洋中學，又一年，也就是民國元年，考入聖約翰大學，在那兒讀了兩年中學和四年大學（自傳，頁 27 - 32）。

聖約翰的教學與管理嚴謹，為使同學在團體生活中陶冶品性，學校規定所有中學生都必須住校，沒有家長請假信，無論平時或週末都不許外出。聖約翰實施「學長階級制」，高、低年級享受的生活條件不同，大學生除了可以外出，還可以吸煙斗，曾先生吸煙斗的習慣也是這樣養成的。聖約翰也實施軍訓，學生依西

方軍隊編為班、排、連、營，並設班長、排長、連長、營長，還有值日官，全校的總司令是營長，負責召集連長開軍事會議，安排操練與人事升降與獎懲。同學的升遷全憑表現與年資，勤奮努力的曾先生，在聖約翰六年，畢業前也才升到副連長。這個制度培養了同學的榮譽感，也鍛練了同學的領導能力。聖約翰是基督教聖公會在上海開辦的大學，非常重英文，也重通識教育，可供選修的課開得很多，文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天文、地理、化學、物理等都有，教師也多為一時之選。廣博的人文教育磨念出了曾先生成就事業的本領，也在六、七十年前為我國政府與民間培育了無數棟樑大材，像昔日外交界的顏惠慶與顧維鈞，政府來台後的國防部長俞大維、行政院長俞鴻鈞、總統嚴家淦等都是聖約翰的畢業生（自傳，頁 33 - 42）！

### 三、 二樂一生，高壽九九

曾先生的夫人名吳馥貞，上海商業鉅子之女公子，為上海中西女塾的高材生。曾先生與馥貞女士乃奉父母之命成婚，但在當時聖約翰和中西女塾被公認為「門當戶對」的結合，且曾先生早從馥貞女士的同學，也就是他的小姑母處，掌握了不少新娘的情報，也就樂得「不勞而獲」。在曾先生的眼裡與心裡，夫人「端麗、嫵媚」，是位「溫、良、賢、淑」的好伴侶，伉儷同甘共苦超過一甲子，是令人欽羨的模範夫妻（自傳，頁 45 -57、頁 877 - 901）！曾先生與夫人育有兩男一女，長子名坦，字伯平，曾任美國赫德森紙業公司總經理，回國後於裕隆汽車公司副總經理任上退休。長女名晰，字仲瑜，上海聖約翰大學畢，聰穎孝順，夫婿為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曾先生晚年，便由她細心照顧。次子名培，字叔和，肄業燕京、聖約翰與嶺南大學，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史雷德藝術學院與巴黎大學攻研藝術史，精英、法、義文，曾任中央社駐巴黎、羅馬特派員、香港中文大學藝術學系主任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興趣和專長與曾先生最為接近（自傳，頁 777- 781、 972 - 975）。

在十九歲時，曾先生生了場幾乎送命的傷寒症，九十歲時患心臟栓塞症後才必須策杖助行，九十五歲割過盲腸（自傳，頁 45、976）。除此，他身體向來硬朗健康，少有病痛，九十歲前依然如年輕時般步履穩健，講話中氣十足、鏗鏘有力。一九九四年元月四日曾先生往生，享壽九十九，這得歸功他堅持天天打坐、散步、打太極。同樣重要的是，曾先生力行自己主張的「二樂人生觀」，自我欣賞完成了的事而「自得其樂」，也重實質而鄙虛榮地「知足常樂」（自傳，頁 961 - 962）。

## 貳、投身新聞傳播與新聞行政

### 一、《庸報》起步，《大晚》展才

曾先生投身新聞傳播實務、行政與教育，和董顯光博士（1887-1971）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董顯光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就讀，只因母親病重而放棄學位回國。一九一三年回國後，他先後在上海的英文報刊 *China Republican*、*Peking Daily News* 和 *Millards Review* 工作，能採、能寫、也能編（董顯光自傳，頁 28 - 38），是當時少見的老練而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一九二五年，他用積蓄在天津創辦中文報《庸報》，一九二九年，他應聘為上海英文《大陸報》總經理兼總編輯，在這些機構，差不多將他在美所學的新聞與辦報經驗全派上了用場（董顯光自傳，頁 44、55-62）。一九二一年，曾先生在天津交涉公署任英文科科長，一九二六年，他被調往漢口工作。交涉公署的工作有名無實，不能一展抱負，此時曾先生結識了董顯光，由於志氣相投，兩人迅即結為亦師亦友的莫逆知交，成為長期合作打拚的伙伴（自傳，頁 70 - 71；陳新萌，1984，頁 226）。

一九二七年底，曾先生應董顯光邀參加《庸報》，客串了約一年的記者，訪問過軍閥吳佩孚，也接觸了報館的營業、印務與編採，種下了對新聞工作的興趣。一九三一年秋，在董顯光介紹下，上海《大陸報》與《時事新報》兩報董事長張竹平邀曾先生負責籌備《大晚報》，出任主筆兼經理。翌年，報紙創刊，曾先生起用年輕人，捨文言而用白話語體文，在新聞採訪、寫作、編排與發行推銷上都大膽創新，打破了上海報界不少陋習，也在上海報界創下奇蹟。當時，正值中日兩國在淞滬地區大戰，民眾關心戰事進展，曾先生掌握此一心理，充份報導戰況時局，不到兩星期，報紙的銷數便飆到五萬份，破了報紙在地銷數的記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西安事變後更達到日銷八萬份。不過，《大晚報》雖然賺錢，但老闆張竹平的另三家新聞機構則經營不善，虧損年年，此時中日已爆發全面戰爭，上海終在一九三七年秋棄守，《大晚報》被迫收場，曾先生也決定投筆從戎了。自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曾先生總計在《大晚報》工作了六年（自傳，頁 107-133、152-157、185）。

## 二、共赴國難，力拼國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全面開戰，中央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董顯光被派為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專責國際宣傳，並薦曾先生兼任國際宣傳處處長職，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先生應董顯光之邀赴南京面謁蔣委員長，乃毅然放棄《大晚報》，董、曾二人也由此開啓了我國近代國際新聞傳播的艱鉅工作（陳新萌，1984，頁 229 - 230）。曾先生的貢獻是鉅大的，早期國際宣傳的構思、佈局、人事、組織與運作差不多全出自其手（自傳，頁 171 - 177）。國際宣傳處成立後，除了統籌駐紐約、華盛頓、舊金山、倫敦、巴黎、新加坡、仰光、墨西哥等地的辦事處外，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與戰時在華的外國記者聯絡，

並負責軍事新聞檢查。經費不足，政策又有限制，事倍功半固然常有，有時還徒勞無功，叫人嘆息（董顯光自傳，頁 121-140；自傳，頁 171 - 352）。

匡助董顯光開展我國國際宣傳，傳達中國抗戰的決心，揭發日軍的殘暴，爭取友邦的支持，培養國際宣傳人員，這些艱鉅工作裡處處都有曾先生的辛勞與汗水，董顯光在自傳中寫道：

「在整個戰時中，分擔我這副沉重擔子最主要的人，當然就是處長曾虛白。他沒有擔任這份工作以前，就跟我先後在幾個崗位上共事了二十多年。他是位飽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學者，又是一位能深思熟慮的設計者。我生性熱烈易衝動，處理事務時極需要這樣一位同事來平衡我的決策。我又是個在西方受教育的人，每遇東西觀念矛盾不能取決時，虛白經常以很冷靜的幾句話或引中國歷史中的一句格言點醒我應循的方向。我在重慶工作的七年中，虛白的辦公桌子永遠面對着我的。凡是我的做事，他都參加並且貢獻意見」（董顯光自傳，頁 130）。

抗戰勝利後，董顯光力辭宣傳部副部長職歸隱美國，國際宣傳的重擔便落到了「有實無名」的曾先生肩上，他先將國際宣傳處自重慶遷回南京，之後獨撐大樑達一年半（自傳，頁 350 - 352）。隨着內戰的擴大，國事每況愈下，一九四七年四月，行政院將國際宣傳處改組成立新聞局，以因應中共宣傳。有感於責無旁貸，董顯光於五月二日復出任局長，鄧友德與曾先生任副局長，分管國內與國際宣傳，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先生隨董顯光辭去新聞局職位止（董顯光自傳，頁 148-157；自傳，頁 413-415）。在險惡的時局和逆境裡，國際宣傳靠的是工作人員的奮鬥衝刺，相當吃力不討好，惟較令人欣慰的是，它為國家培育了傑出的外交與新聞人才，如葉公超、溫源寧、夏晉麟、汪公紀、沈劍虹、魏景蒙、朱撫松、沈錡、崔萬秋、徐鍾佩、余夢燕、王洪鈞、周森鏞、凌崇熙、陶啓湘、周翻萍、謝善才、朱新民、張彼得、王家楫、倪源卿等都曾是國際宣傳處與新聞局的幹將（董顯光自傳，頁 148-157；自傳，320 - 322；陳新萌，1984，頁 234）。在國際宣傳與創設新聞局上，董顯光與曾先生闕功至偉，說董顯光是國際宣傳與新聞局的生父，那曾先生就是國際宣傳與新聞局的養父！

### 三、中廣發聲，再創懋績

中國廣播公司是曾先生得以發揮長才的另一重要機構，中廣的前身是一九一八年於南京成立的中央廣播電台，後改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對日抗戰勝利後，政府即計畫改組為公司，惟因國共內戰漫燒全國而受阻滯。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十一月公司終於改組完成，董顯光出任第一任總經理，曾先生與吳道一任副總經理，分管節目與工程。曾先生乃汰劣立新，網羅名家以強化文藝性節

目，設「青年講座」，談婚姻、讀書與修養，以吸引青年聽眾。此外，曾先生亦配合大陸中共情勢製作特別節目，幫助聽眾瞭解中共的專制作為與對藝文界之鉗制和壓迫（自傳，頁 473、483- 487）。第二年十月，曾先生奉命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乃辭卸中廣副總經理職，但仍繼續主持自撰自播的時事評論《談天下事》。從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零年九月二十五日止，《談天下事》足足播出二十年整，打破了廣播政論的記錄。一九七零年與一九七一年，曾先生自二百八十萬字中選出一百九十萬字編輯成《談天下事》之「韓戰年代」與「越戰年代」出版。一九八二年三月，行政院新聞局在廣播電視金鐘獎頒獎大會上致贈特別獎，以表對曾先生對廣播電視貢獻之崇敬（自傳，頁 493- 499）。

董顯光任中廣總經理，又堅邀曾先生任副總經理，是有特別用意的，因為當時美國政府成立了一間名為西方企業公司 Western Industrial Enterprise 的機構，負責蒐集有關中共的資料情報，從事對中共大陸的反共宣傳心戰。中廣奉政府命與西方公司在台分公司合作，而主責聯繫的便是董、曾二人，代表美方主其事者係甘露德 Rodney Gilbert，是他們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與中國新聞學院的同事、好友。甘露德負責中波廣播工程，節目則歸曾先生策劃。中廣與西方公司的合作愉快，但只維繫了不到三年，因為甘露德於一九五一年底任滿回美，繼任者堅持將節目權畫歸美方，為董顯光所拒。為打破雙方僵局，中央乃將對大陸廣播之心戰工作移交負責對大陸工作之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另組中央廣播電台與西方公司合作，中廣對大陸的心戰廣播也就此結束（自傳，頁 474- 483；陳新萌，1984，頁 237）。

#### 四、建新聞通訊網，服務傳媒

政府來台初期，曾先生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主管台灣之新聞、宣傳與文化工作，並兼中央通訊社社長。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日，曾先生接中央社社長時，中央社位於西門町一棟老舊木屋，不但簡陋，而且擁擠不堪。在這個百廢待舉的職位上，曾先生首先安頓了各地來台的同仁，接着又四處籌措經費，盡速恢復國內外的通訊業務，成立英文部，收發外電及英文稿件，迅即與外國通訊社續約，重建各地海外辦事處，建立國際通訊網。與此同時，曾先生設法將位於鬧區的木屋出售，另擇較偏之松江路蓋建新廈，更將舊樓換新廈的七十多萬餘款作為員工福利基金。一九六四年元月，中央社喬遷入新廈。四月一日，中央社於新址慶祝成立四十週年酒會，此時中央社已頗具規模，發展成一擁有國際聲望的通訊社了（自傳，頁 579 - 650；馬之驢，1986，頁 76-92）。

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四年，曾先生任中央社社長共十四年，改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主任委員任上退休，總計服務了二十二年。曾先生在任上的另一大功績是致力促使中央社「公司化」，使它替國家做事的身份可

以名正言順、化暗爲明，而不必年年爲經費偷偷摸摸及四處求人。曾先生退休後十個月，中央社終於轉爲公司，仿效美聯社模式，由台灣各公私營報社、電台、電視投資，並推派代表組織董監事會，使我國的新聞通訊業務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自傳，頁 607 - 609、649 - 650；馬之驩，1986，頁 93）。

在中央社服務期間，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八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曼谷召開第一次東南亞新聞發展會議，曾先生以中央社社長專家身份出席，被主席團提名爲「新聞通訊社小組」副主席，會上蘇俄塔斯社社長意圖阻擾，曾先生據理力爭、借力使力，塔斯社社長終未能得逞。會上，曾先生還提案建議成立地區性東南亞通訊社五年計畫，以抗衡西方通訊社之壟斷，並蒙大會接納研辦（自傳，頁 698-703；陳新萌，1984，頁 243 - 244）。一九七八年四月，美國大眾傳播學泰斗宣偉伯 Wilbur Schramm 教授來台，出席政大新聞所與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合辦之學術會議，曾先生、馬星野、王惕武、徐佳士等新聞前輩設宴款待，我亦應邀敬陪末座。入席時，兩人甫坐定，宣偉伯與曾先生就互相認出來了，原來宣偉伯是二十年前美方代表，親眼目睹了曾先生與塔斯社社長短兵相接的宣傳肉搏戰。對當時激辯的情況，宣偉伯還說他記憶猶新。這件事說明了我國處境的艱難，也反映了我駐外人員在國際場合奮力戰鬥時所受的委屈。

中央社是個服務國內外傳媒的新聞集散機構，對國內言，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信息昂貴且不甚流通，中央社在全球各主要大城蒐集新聞，向各地方報與電台及時供應國內外新聞與資料，對提升國民的世界觀是功不可沒的。在國際上，中央社向全球各主要傳媒發佈有關台灣的新聞，使世界各友邦國家能聽到台灣的聲音、看到台灣的勵經圖治，拓展台灣的國際關係，也間接促進了台灣的外貿。

曾先生投身公職自加入中宣部主持國際宣傳處處長始，來台後服務於中廣與中央社，所從事的新聞傳播工作是領導與行政管理遠多於「火線」作業。實際上，先生在台灣的工作承繼了大陸時期的國際宣傳，所不同者爲形式。當然，新聞工作比國際宣傳廣闊與超然。在承平時期，新聞與宣傳理應各自獨立，但在風雨飄搖的年代，在國家危在旦夕的對日抗戰時期，在國家隨時面臨赤化威脅的緊急階段，曾先生及同儕在國內外逆勢之中奉獻、打拼、犧牲，他們的「非常態作爲」不但可以理解，而且顯得格外可敬了！

## 參、新聞傳播教育家

### 一、金陵開講，重慶育英

一九一八年，曾先生自聖約翰大學畢業，先是任上海青年會英文教師，首與

教育結緣。翌年，膺湖南長沙雅禮醫學院英文教師（自傳，頁 59 - 60）。一九三一年，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女子大學前身）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教授「中國文學史」、「小說研究」、「詩詞研究」等課（陳新萌，1984，頁 226 - 227），使曾先生有機會落實合經師與人師為一的古訓，並且萌生了以教書為志業的想法（迎曦集，頁 304-305）。

曾先生從政與抗日戰爭有關，參與新聞教育亦然。當時負責國際宣傳大任的是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他認為國際宣傳最需要的是精英文的人才，經核准後，一九四二年年底，董顯光找上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同學、當時任院長的 Carl Ackerman。在美國國務院的支持及 Ackerman 的大力協助下，中央政治學校於一九四三年在重慶辦起了中國新聞學院，為國家培養精通英語的國際新聞與宣傳人才。董顯光自任院長，曾先生任副院長兼實習英文報 *Chungking Reporter* 《重慶新聞》社長。哥大新聞學院則派 Harold L. Cross 任教務長，Rodney Gilbert、Richard T. Baker、Anthony Dralle 與 Floyd D. Rogers 為教師，Ackerman 本人亦親自授課。中國教師則有甘乃光、潘公展與馬星野等，分別講授中國政府、三民主義與新聞學。中國新聞學院只辦了兩期，畢業了五十九名學生，而學院也隨着抗戰結束而結束了。重慶的經驗雖然只有兩年，卻為國培養了優秀的新聞、國際宣傳、外交、學術人才，如王洪鈞、余夢燕、周森鏞、凌崇熙、李蕙苓、殷珊姑、沈昌瑞、歐陽美生、高克方等都是該院的畢業生（董顯光，1967；Boylan, 2003，Chapters 15 & 16）。

## 二、木柵創所，主講民意

一九五四年，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北復校，成立新聞研究所，曾先生任所長，第二年，大學部恢復新聞系，再兼系主任。翌年，謝然之接任系主任後，曾先生專任新聞所所長。曾先生是位「無為而治」的領導者，他的新聞教育哲學是理論與實務並重，做法是要在承繼傳統的基礎上從事研究，以因應快速變遷的社會，也要培養有開闊視界的通才。因此，新聞所招生不限新聞主修生，凡政治、法律、文學、藝術、社會、心理等皆可報考。優秀的學生必須有名師教導，曾先生乃聘請國內具有專長的新聞界耆宿擔任教授，並向美國弗爾布萊特基金申請經費，每隔一年聘一位教授來台，總計在一九六九年卸任所長止的十五年任內，共聘請了六位美籍、二位日籍的客座教授，開設公共關係、大眾傳播、民意、國際傳播、新聞採寫等課（自傳，725-728）。我在新聞所兩年，除曾在重慶任教的 Richard T. Baker 教授客座了一學期外，來短期講學的還有介紹行為科學研究的哥大新聞學院喻德基教授、演講民意理論的日本世論協會會長小山榮三教授與研討科學新聞的哥大新聞學院 John Foster 教授。曾先生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國際觀，在新聞所創建初期，他請我國駐日本大使董顯光協助，促成了新聞所第一班同學遠赴日本參訪一個半月，考察當地的通訊社、報紙、電台（李瞻，2005，頁 205-214）。



在新聞所，曾先生自己開「民意原理」一課，從儒家的民本思想講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美國的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他講經典的政治公共哲學，也講當代社會科學態度與行為改變的理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民意或輿論課的不多，他可能是台灣的第一位。研究所畢業後我赴美留學，才發現曾先生差不多已經掌握了主要的文獻，這在經費不足、信息不流暢的年代是相當不容易的。

### 三、大師開創，新聞傳播研究邁步

曾先生主持新聞所，最大的貢獻不在個人的教研，而在促成、推動和開創了政大及台灣新聞傳播教育的優良傳統。首先，他於一九六二年向亞洲基金會申請款項，邀約閻沁恆、陳聖士、李瞻、亓冰峰、朱傳譽、張玉法、常崇寶、黎劍瑩等人分章撰寫《中國新聞史》，歷時四年而成，並於一九六六年印刷出版（自傳，738-743）。《中國新聞史》是一九二六年戈公振《中國報業史》出版後的第一部新聞傳播史，它跨出了傳統的報紙，涵蓋了新興的廣播電視媒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這部巨著是海峽兩岸三地許多大專新聞院系的教科書。受到經費與資料不全的限制，這本長達七十萬字的歷史確有不少缺失，但將我國新聞傳播史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與此同時，曾先生亦聘請蒐集了大量新聞傳播史料的朱傳譽先生來所任教，支持他研究先秦傳播、中國歷代民意、言論與新聞自由發展史，為新聞傳播歷史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

曾先生在新聞所的另項長遠供獻是促成《新聞學研究》出版，第一期由朱傳譽任執行編輯，以新聞自由與自律為主題，有論文、譯介、史料和研究新聞自由與自律的參考書目，呼應了曾先生在〈發刊辭〉中的揭示：「因為傳播事業的發達，新聞學不再是一門研究技巧的學科，而變成了社會科學中重要的一門」。從一九六七年到二零零九年七月，《新聞學研究》已出版二百期，是全球華人新聞傳播學界歷史最久、審稿最嚴與水準最高的學術期刊。

我國第一位傳播學博士朱謙曾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在政大新聞所任教，開設大眾傳播研究課程，引介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在曾先生全力支持下，開展傳播研究。曾先生九秩華誕時，朱謙教授寫道：「文章道德和提攜後學不遺餘力者惟虛白先生和史丹福業師宣偉伯教授二人，宣偉伯是大家公認為大眾傳播學的泰斗，而開創中國近代新聞學及傳播研究的大師除虛白先生外莫屬也」（九秩華誕特刊，頁85）。朱謙教授是我在美國南依利諾大學求學與夏威夷東西中心從事研究的業師，我知道他不是位輕言取悅他人的學者，我也見證、經歷了華人地區四十年多來新聞傳播研究的發展，朱老師對曾先生的讚頌是「於吾心有戚戚焉」的！

#### 四、再戰文大三研所

一九七三年，曾先生應中國文化學院邀為華岡教授，任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兼博士班主任。曾先生係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但對「奉命照辦」或「照本宣讀」的辦學並不苟同，他給自己的使命是要將三民主義的研究學術化和國際化。於是，他聘名師從教育、法律、經濟、社會、政治等不同角度鑽研。於是，他在招生時要審查申請者的碩士論文，還要考他們用英文論述三民主義的能力（自傳，頁 783-826）。見到商業主導的新聞傳媒未能照顧社會大眾利益，曾先生念茲在茲的便是建立一個非謀利、「公營」的三民主義傳媒制度（舊釀新焙，頁 133-153）使傳播事業成為「非國營」、「非政府營」，而「純純粹粹由整個社會全體人民共同經營管理之」（自傳，頁 758）。這個理想當然崇高，卻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拖邦，因為如落實為政策可能會引發更多問題。從追尋真理的角度看，揚棄教條式的單向灌輸，運用科學理性的方法研究某一主義，這是正確的。但從學術自由的角度看，獨尊某一主義則又有違追尋真理的客觀原則。曾先生生於衰敗的清末，長於民初軍閥混戰，經歷過八年堅苦抗戰，見證了國共的慘酷鬥爭，到了台灣才有機會專心從事國家建設，他篤信並宣揚三民主義就不足為奇了。在他那一輩人中，不少人都有此執着，這是動蕩亂世對他們的影響。

曾先生對教育的關心是全面而前瞻的，一九五三年九月，他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訪問四個月，考察美國工人與農民現況及工商企業管理，並參觀新聞通訊社、報館、電台。當時，美國電視已經普及，曾先生特別為這個新興科技的教學與社教功能所吸引，返國後他將心得報告呈報當局，力陳建立以公益與教育為主體的公共電視制度之社會功效及必要（自傳，頁 651- 690；迎頭創建，1955；老兵記往，1978；陳新萌，1984，頁 240-241）。曾先生深知新聞傳播對社會影響至鉅，時以提升新聞傳播素質與道德為念（自傳，頁 764- 773），一九七零年代初便曾函諭我在美留意普立茲新聞獎之運作，蒐集相關資料。一九七四年，曾先生八十壽誕，親友、學生發起籌募基金，成立「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每年頒贈對新聞報導與新聞學術有卓越成就者獎金（自傳，頁 773 - 774）。一九八二年三月，新聞局在廣播電視金鐘獎大會頒贈先生特別獎，表彰他在廣播電視上的功績。同年九月，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致贈曾先生紀念銀屏，表揚他對新聞教育之卓越貢獻。一九八三年，中國文化大學頒贈曾先生榮譽文學博士，以褒揚其對國家與教與育之建樹（陳新萌，1984，頁 252，256）。一九八六年，行政院頒贈曾先生文化獎，嘉許他對復興中華文化的貢獻（自傳，頁 967- 968）。

#### 肆、結語

曾先生是「多元創業專家」，一生都在忙，忙追求知識，忙新聞業務，忙為國宣傳，忙教書。他忙的事固然不同，但皆與大眾傳播有關，都是「無中生有」

開創性的事業，而且也是他樂意做的事（馬之驢，1986，頁 121）。曾先生能者多勞，經常身兼數職，無論處在什麼崗位，總把國家社會的利益放在個人利害之前，是位徹頭徹尾的愛國者。在追憶與曾先生的共事經驗時，董顯光稱讚他「是位飽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學者，又是一位能深思熟慮的設計者」（董顯光自傳，頁 130）。對日抗戰時曾在國際宣傳處追隨曾先生的朱撫松稱讚他「為一般公教人員樹立一個令人十分欽仰的楷模」（九秩華誕特刊，頁 73-76），蘇雪林說他是「政論家、文學家、新聞學家」（九秩華誕特刊，頁 69），陳紀澄說他是「傳播界的瑰寶」（九秩華誕特刊，頁 71）。一九八三年，曾先生八九壽誕，他在中央政校和中央社的老友、新聞界耆宿馬星野賀道：「曾經滄海，虛懷若谷，白雲在天，俯覽無餘」（冷若水，1984，頁 269）。這些稱讚絕非客套溢美，乃是舊雨的心語，也是眾人之共識！

曾先生伉儷鶼鶼情深，結褵六十五載，兩人晚年皆鶴髮童顏，幾乎每天都在住家附近攜手漫步。對子女，曾先生從不疾言厲色，反倒常和他們嘻鬧，用身教代言教。曾先生身材高大，望之道貌儼然，可他待人隨和，臉上常帶慈祥笑容，在部屬與學生心中是位「即之也溫」的開明長者。曾先生一生滿懷憂患意識、時時記掛國家安危與建設，然而我沒在課堂上聽他誇談過什麼愛國的大道理，他只用行動實踐理念，向同胞與年輕人示範。曾先生擔任過不少要職，但最感滿足的則是從事新聞與教育工作，自喻兩者合而為一、交織成了「一根辮子」。曾先生桃李滿天下，許多學生在新聞、外交或學術界都有傑出成就，見到學生「出將入相」，自己也會「不禁歡喜若狂」（自傳，743-750；迎曦集，頁 303-308）。

在曾先生任政大新聞所所長的最後兩年，我有幸做了他的學生，並選讀了他開設的「民意原理」。當面，同學們叫他「老師」，私底下，我們尊稱他「曾老」。我對老師們向來敬畏多過親近，直到我與同學翻譯貝克老師《美國報業面臨的社會問題》，我去請曾先生寫序並為書名題字，才和老師有了互動，後來我與內子文訂，更蒙老師福證，使我們倍感榮寵。曾先生溫文儒雅，是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君子。讀研究所時，教我們「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朱傳譽老師蒙受不白之冤，曾先生三訪情治首腦，並聯同另兩位國民黨新聞界元老馬星野與謝然之去函警備總部為朱老師辯護，可惜依然徒勞（朱傳譽）。朱老師蒙難，我還在新聞所就學，親聞曾老師為他奔走，也曾親見老師無奈搖頭歎息！這些往事都四十年了，但老師的風采與義行，現在都依然歷歷在目。

曾先生飽讀傳統詩書，亦受深受西學洗禮，一生樸實無華，凡事身體力行、努力不懈。文學本係曾先生最愛，惟因國難而放下。在自公職退休前，曾先生不是全職的學者或教育家，他留下的著作不少，惟以政論與時評為多。無論是寫文章、擔任公職或教書，他時時處處都以國家社會為念，一生夙夜非懈。用身教，曾先生為社會留下了典範。（二零零九年二月中於警未居）

## 參考文獻

- 朱傳譽，〈兩字破家•一葉知秋：從我的文字獄看台灣人權〉，未刊稿，約寫於 1995 或 1996。
- 冷若水主編，《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通訊社印，1984。
- 李瞻，《大時代見證：萬里孤鴻》，台北：三民書局，2005。
- 董顯光，〈憶本校戰時的新聞學院〉，《政大四十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67，頁 54-57。
- 董顯光，《董顯光自傳》（曾虛白譯自英文原著），台北：台灣新生報社，1972。
- 馬之驢，《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台北：經世書局，1986。
- 陳新萌，〈虛白先生年譜〉，《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特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印，1984。頁 223-257。
- 曾虛白，〈迎頭創建電視實業的重要〉，董顯光等著，《新聞學論集》，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化出版委員會，1955。
- 曾虛白，〈園山飯店與林家花園〉，《板橋林宅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東海大學建築學系，1973。
- 《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特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印，1984。
- James Boylan, *Pulitzer's School: Columbia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1903-200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15. "Outpost in Chungking"; Chapter 16, "Sweat and Tears")

## 附錄：曾虛白先生主要著作

- 《英雄與英雄崇拜》（卡萊爾原著之譯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 《革新芻議》，台北：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51。
- 《談天下事》（第一集）（廣播評論），台北：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51。
- 《工業民主制的理論與實施》，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 《美遊散記》（原名《東遊散記》），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台北：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77。
- 《中國新聞史》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6。
- 《國父思想對時代貢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66。
- 《世變建言》，台北：三民書局，1969。
- 《屐痕心影》，台北：三民書局，1969。
- 《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 《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 《董顯光自傳》（翻譯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台北：台灣新生報社，1972。
- 《老兵記往》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4。
- 《民意原理》台北：華岡出版公司，1974。
- 《晨曦漫步觸感》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6。
- 《檻外人語》台北：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7。
- 《上下古今談》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8。

- 《舊釀新焙》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
- 《曾虛白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化出版公司，1981。
- 《擊楫中流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1。
- 《迎曦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三面釋》台北：陽明山莊，1983。
- 《曾虛白自傳》，上、中、下三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